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杨永明

(宜宾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系, 四川 宜宾 644000)

摘要: 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至深且巨。从积极方面讲, 中国共产党“以苏为戒”,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从消极方面讲,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负面影响, 大力为斯大林模式辩护, 结果误入歧途。反思这段历史, 对于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苏共二十大;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斯大林; 个人崇拜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15(2009)04-0139-06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 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 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 尤其是在大会即将结束时所作的秘密报告, 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尖锐批判。苏共二十大对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可以说是至深且巨的。毛泽东最初的反映是: “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1]370}, 喜的是赫鲁晓夫揭了盖子, 忧的是赫鲁晓夫捅了漏子。本文拟就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作一简要论述。

一 一则以喜: 揭了盖子

建国前夕,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正确总结, 明确指出: “走俄国人的路, 这就是结论。”^{[2]1471} 建国以后, 我们更是以苏联为榜样, 在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成为当时所有中国人的共识。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是社会主义的典范, 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不

向苏联学习怎么行呢? 毛泽东说: “建国之初, 没有办法, 搬苏联的。”^{[1]365} 后来他又说: “解放后, 三年恢复时期, 对搞建设, 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 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 但总觉得不满意, 心情不舒畅。”^{[3]117} 这种既不满意又无办法的无可奈何, 因苏共二十大而发生了改变, 尽管是喜忧并至, 但毕竟是喜大于忧。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所谓秘密报告, 揭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奉行个人崇拜、独断专行, 在30年代的大清洗、大处决中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 暴露了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走的弯路。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对斯大林的神化, 让人们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并非完美无缺, 像斯大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会犯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极大地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 要求各国共产党人结合本国实际, 在实践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是基于此,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积极评价, 认为赫鲁晓

收稿日期: 2008-10-22

作者简介: 杨永明(1968—), 男, 四川通江人, 宜宾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进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夫揭了盖子。

苏共二十大期间,毛泽东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正在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打破了斯大林神话,解除了毛泽东的思想负担,使其精神为之一振。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3月17日,在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同志们认真研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作了两点破题之解,认为:“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4]4-5}3月19日、24日,毛泽东又两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进行了充分讨论,毛泽东一共讲了四点意见,其中第四点再次重申了17日书记处会议上发表的两条意见。他说:“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4]6-7}而补救的办法就是通过发表文章的形式,从正面讲一些道理,既表明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又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些分析,旨在引导人们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最终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后简称《一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于1956年4月5日公开发表。该文主要回击西方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攻击,从正面肯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并分析了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着重论述了反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5]263}文章还号召反对教条主义,认为:“教条主义只是思想懒汉才会加以欣赏的东西,它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是有百

害而无一利的。从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鼓舞人民群众的生气勃勃的首创精神、促进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迅速发展等方面说来,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5]267}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正是本着“以苏为戒”的宗旨,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缺点,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毛泽东花了两个多月时间,与34个国家部委的主要领导谈话,最后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在这篇文献的开篇就讲:“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23}可以说,十大关系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将中苏进行直接比较而得出的结论。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369-370}这也就是说,毛泽东这时的探索还主要体现在政策和方法层面,还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但是他已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迈出了探索之路的第一步。

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117}八大通过的决议和政治报告以及各位代表的发言,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中共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在经济建设方面,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就是对苏联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决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

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6]13}这里已经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也讲到如何调整国家机关和企业的管理权限问题。他说：“国家机关对于企业管得过多、过死，妨碍了企业应有的主动性和机动性，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该管的事。”^{[7]233}除了对经济管理乃至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对于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何加强集体领导、克服个人崇拜，如何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党派关系等，都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

为什么八大能够取得如此重要的理论成果呢？毛泽东在八大期间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他认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1]127}。毛泽东对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法制，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独断专行，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脱离群众，实行命令主义等错误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说：“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1]19}看来，毛泽东不仅认识到了斯大林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开始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去避免这样的错误在我国的重演。

八大以后，毛泽东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继续探索。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

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以便让私营工厂与国营工厂进行竞争，并把这种设想叫做“新经济政策”。为此，他还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造成社会物资长期供应不足。他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170}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这与他在一一年前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8]198}的讲话相比，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不仅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认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1]204}，而且提出了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1]216}。在这个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于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种认识为日后的改革开放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应该说苏共二十大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为戒，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有些思想观点在今天听来都还是掷地有声的。不可否认，如果不是苏共二十大打破斯大林神话，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毛泽东在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的批语中所说：“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380}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条路线的形成是与苏共二十大分不开的。

二 一则以忧：捅了漏子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进行大批判，虽然有助于各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它既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思想混乱，也给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进行反苏反共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借口。正如英共总书记高兰所说：“斯大林

问题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我们认为,苏联同志把斯大林问题处理得很坏很坏。这本来就是困难和复杂的问题,但是处理的结果又造成了最大限度的困难。我们党内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都发泄出来,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我们党没有前途。我们多数党员是坚定的,但是我们丧失了七千党员。”^{[9]494-495}随着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相继发生,尤其是铁托在普拉演说中提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产生的严重负面影响就显露无遗。

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当时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进行反苏反共活动,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动摇甚至变节分子,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出现了分裂的危险,帝国主义则幸灾乐祸。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4]16},要考虑再写一篇文章来回答国际上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那么如何顶住,如何反击呢?关键就是要对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铁托的普拉讲话表明我们的态度。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苏共二十大发表了“丢刀子”的重要讲话。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8]321}毛泽东不仅认为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而且把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因为他们主张和平过渡,否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性。由此可见,毛泽东把波匈事件的发生以及国际社会出现的反苏反共活动都归结为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带来的恶果。同时毛泽东也认为波匈事件的发生是由于阶级斗争进行得不彻底所致。他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8]323}这为我国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伏笔。

为了回击帝国主义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澄清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迷雾,从11月25日起,在随后几天里,几乎每天毛泽东都要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在讨论中,毛泽东认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公开提出“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因为苏联革命和建设,“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10]78}。讨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斯大林的功过是非。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4]27}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成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5]268}

对于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从一开始中共就与苏共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在1956年3月19日和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他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开,倒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他认为,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10]12}。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42}为了共同对敌的需要,也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论》并没有就斯大林的评价问题鲜明地表示中共的态度,只是笼统地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分析斯大林,比较策略地为斯大林进行了辩护。

但是,波匈事件的发生和铁托的普拉讲话,都表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已经成为影响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内部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相互团结的重大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重大问题”^{[11]543}。显然,如何正确对待斯大林,就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了,而是关系到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问题。因此,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后简称《再论》),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分析了斯大林后期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指出:“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11]545}这就是说,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是正确的,这无异于全面肯定了斯大林模式。文章还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是共产主义队伍中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点名批评了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他领导同志,认为他们对斯大林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和立场都是不正确的。

当时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花大力气为斯大林辩护呢?1958年7月底8月初,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说得非常明白:我们相信斯大林,“相信他的学说和经验。而现在,这一切全部一笔勾销了。我们有丧失几十年英勇斗争的成果的危险,有丧失共产党人的威信的危险,有丧失信仰的危险”^{[12]288}。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斯大林辩护也就是为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行辩护。

《再论》一文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强调了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和保卫十月革命道路在现阶段的重要意义,认为:“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 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11]542}文章号召除了反对教条主义外,还要反对“修正主义”,认为:“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

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11]551}所谓修正主义,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就是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界限;借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企图削弱或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领导的作用;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后来甚至发展为把任何针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都认定为修正主义。

三 结语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自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先对其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说赫鲁晓夫既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对赫鲁晓夫勇于揭盖子之功进行了充分肯定,认为他打破了斯大林神话,极大地解放了各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但是,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补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上,虽然还是肯定了赫鲁晓夫“揭了盖子”之功,但是其关注的焦点已经是如何补救“捅了漏子”之祸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也逐渐从肯定多于否定转变为否定多于肯定乃至最后全盘否定,对苏共二十大的经验也从反教条主义转变为主要反对修正主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从力图突破斯大林模式转变为全面为斯大林模式进行辩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邓小平后来总结说,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没有搞清楚所致。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把通过苏联模式认识的社会主义看成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把计划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看成是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对背离这二者的任何改革都视为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是修正主义。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国内狠抓阶级斗争,在国际上主张既反帝国主义又反修正主义,最终走

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道路。

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在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力图走出一条比苏联发展得更快更好的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始终未能突破苏联模式,相反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走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唯意志论道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不达,适得其反。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步突破了苏联模式,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反思这段历史,让我们倍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之不易,理应倍加珍惜。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G]//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G]//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 [5]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G]//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6]陈云.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M]//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G]//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9]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0]吴冷西.十年论战: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11]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G]//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2]尼·特·费德林.1958年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争论[G]//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The Influence of the 20th Conference of the CPSU on the CPC

YANG Yong-ming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Yibin College, Yibin, Sichuan 644000, China)

Abstract: The 20th Conferen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Soviet Union exerts a far-reaching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f which the positive aspect is that the CPC draws a lesson from the Soviet event and makes fruitful exploration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ays, while the negative aspect is that the CPC makes great effort to defend Stalin model,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olidar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nd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Khrushchev's secret report, which leads the CPC astra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PC to reflect upon the historical event, to follow the way firmly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20th Conference of CPSU;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o Zedong; Stalin; personality cult

[责任编辑:凌兴珍]